

迟到百年的认可

——一战华工记事



□ 陶遵臣

一战期间，大约 14 万中国人远涉重洋，来到欧洲西线战场，为英法军队提供后勤保障，他们搬运补给、挖战壕、抬尸体，为一战的胜利作出贡献。至少 2000 名赴欧华工在一战中病死、战死，但他们险些被历史遗忘了。

中国派遣劳工赴欧

1916 年，英国、法国等协约国家劳动力吃紧，需要大量人力时，纷纷要求中国参战，加入协约国。当时的段祺瑞执政府应协约国要求，派遣中国劳工进入欧洲。

得到中国政府的许可后，1916 年 10 月，英国在威海卫设立招工局和华工待发所，英法传教士则在山东、直隶等地进行招募活动，一批批农村青年涌入威海卫。这些人员经过报名登记、体格初检、签订合同等手续之后，又被编排成班、连，开始队列、行军、体操等体能训练。经过短期集训之后，登上英法商船，被运往欧洲战场。从 1917 年年初至 1918 年年中，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从威海卫出发的华工达 54000 多名，威海卫成为当时中国最大的华工招募基地。

英国人在山东和外省各地招募的华工，源源不断地来到招工局在威海卫设立的“华工待发所”，集结待发。他们经过查体检验、照相登记、按手印、戴“手铐”等程序后，换装编组，按班、排、连的军事编制组织起来，每日在“高丽口子”的沙滩上，由英国军官指挥，开展军事训练，等待来船出发。

经过集结训练的华工，等到英国军方安排的远洋轮船到来后，立即登船出发。现在看到的资料记载，1917 年 1 月 18 日至 1918 年 1 月 7 日的一年时间里，就有“透克罗斯”号、“安提罗科斯”号、“俄国女王”号等 24 艘远洋轮船，来威海卫载运华工。一般是每个月两三艘。这些船，小的能乘千把人，大的可运 2000 多人，最大的一条装载了近 3800 人。为了躲避德国潜艇，华工船在海上走得不快，一般要漂荡 1 到 3 个月才能到港。多数是到英格兰岛西北的海港利物浦下船，也有直接运到欧洲的港口，如法国马赛港、阿佛尔港。还有很多是在美国西部港口，用火车转运，横穿美洲大陆后，再登船运往欧洲。后来，因为高丽码头水深不够，华工上船需要转驳倒运，英国人嫌登船速度慢，加之威海不通火车，华工开始转到青岛登船。

华工们唱着出洋歌赴欧

“正月里梅花开迎接新春，闻听说大英

国来招工人，修铁路保马路整理房舍，绝不派战斗事扛炮当军。”从山东省广饶县人蒋镜海的日记记述中可以看到，华工是唱着这样的歌曲出洋的。蒋镜海 1917 年初报名应聘华工，随后拿到了编号为 97230 的华工登记单，成为一战时期英国招募的华工。所有华工在合同存续期内，编号即代表劳工本人，号码就是劳工的身份证，根据号码付工钱，分配衣食和任务。

1917 年春天的威海卫，蒋镜海和毕粹德、朱桂生等华工背着行李默默地站在队伍里，等待登船。当时的他们面对遥远的欧洲茫然无措，他们心中唯一的希望是能挣点钱活着回到老家。当蒋镜海与其他的华工到达法国马赛港的那一刻，他们在海上漂浮了近 3 个月的心终于落了地。因为从离开中国那一刻起，华工们就面对着生死未卜的命运，死亡的危险如影随形。1917 年 2 月 24 日，德国潜艇在地中海海域击中运送华工的邮轮，船上 543 名华工全部葬身大海。但这并不是幸福生活的开始，他们甚至来不及舒展因为长途劳顿而疲惫不堪的身体就立刻被送到了前线。

华工们被迫投入战斗

到达欧洲的 14 万华工，其中有 96 万人被分配给英军，3.7 万人由法军支配，1 万人被“借给”美国赴欧远征军。华工们被送上前线后，除承担挖战壕、运弹药、埋尸体、修路架桥等危险工作外，很多人被迫投入战斗。无论是在后方，还是在极其危险的前线，华工们的工作环境都非常恶劣。有的染病而亡，有的则因饥饿与劳累抛尸他乡。

蒋镜海的日记有这样一段记载：刚到法国，由于对现代战争一无所知，当德军飞机铺天盖地而来时，许多人跑出战壕观看，结果敌机既投弹轰炸又俯冲扫射，致使许多华工被炸得血肉横飞。

1917 年冬季，他们挖战壕的地方已在敌人步枪的射程之内，有些地方与敌人战壕相距不过 100 米。他们是站在敌人战壕前挖战壕，战壕挖好之后，英兵才进来，所以他们实际是在最前线。遇到下雪时，满脸飘着雪花。到了天晴雪化，境内泥浆没膝。轮班睡觉时也只得站着睡，这是与当初所订合同中“不参战”的条款不相符的。

毕粹德（编号 97237）被送到欧洲西线战场，负责挖掘壕沟、打扫战场等工作，隶属英国军队管理。然而，当他再次“见到”来自家乡的人，已经是 90 多年后了。此刻，他长眠在法国国家姆省博朗古的小村庄里，墓碑上刻着“编号 97237，卒于 1919 年 9 月 27 日”。

据中国公使馆统计，当时在英军服务的华工中，有名有姓的死亡者就达 9900 人。实际上，根据战后的清点和统计，在法军和英军中的华工死亡者和下落不明者接近两万人。

华工是所有外国劳工中最优秀的

1917 年 8 月中国向德国宣战以后，在法国的中国劳工开始在前线挖掘尸体以便于日后把他们埋入军人公墓。在 1917 年法国皮卡第的一场战斗中，英军士兵全部负伤，修缮

战壕的华工们就拿着手中的工具冲入阵地与德军搏斗，当援军赶到时，大部分华工已经战死。而根据英国首相劳合·乔治的记述，在加莱和敦刻尔克工作的中国劳工还遭受了空袭，在加莱的一次空袭中有 8 名中国劳工遇难。

在欧洲战场上，华工们超强的适应能力和吃苦耐劳的精神给西方人留下深刻印象。英国记者韦克菲尔德说：“每一位华工都是顶呱呱的多面手，能忍难忍之苦，工作风雨无阻、冷热不惧……善于学习，对英国远征军的各项工作需求，都能应付自如。”法国军队总司令福煦曾在给法国总理的信中写道：“华工是非常好的劳工，他们可以成为最好的士兵，在炮弹的狂射之下他们能保持很好的姿态，毫不退缩。”

华工的付出与回报不成正比

在蒋镜海的日记里，我们能从老人的笔尖下，感受到在那个屈辱年代，西方列强对华人的轻视以及中国人的自强之心，日记里有这么一段文字：“民国八年七月十九号，法人菜园葱、蒜、芸豆等被人偷窃，园主告之法国巡捕。巡捕领园主先至 BC 队各工人寝室（中国人的宿舍），搜寻一遍而无一。寻至英人寝处则葱、蒜等等连叶带蔓翻出十三袋之多。甚矣，英人之不知耻也。”当时的中国贫民弱，连普通的华工也被当作劣等人首先被怀疑。

作为华工中为数不多的知识分子，蒋镜海与华工们组建了旅欧同人会，制定了《旅欧同人会简章》，把在欧洲的华工组织起来，互相帮助。日记中记载的《旅欧同人会简章》，证明华工在国外时有自己的组织。另外，按照合同约定，华工的工钱为每天 5 个法郎，工作 10 小时，有周末与节假日，但是到达战场后，扣去伙食费、住宿费、置装费及医疗保险，工资缩水一半只剩 2.5 个法郎左右，而当年前线的法国士兵每日薪金为 10 个法郎。1919 年的英国议会会议备忘录中也不得不承认：“华工比其他有色种族的劳工担当了更大的风险，但是他们甚至连几块小小的军功章也未能得到。”

1918 年 11 月 11 日，持续了 4 年的战争终于结束。同年 11 月 16 日，英国殖民大臣专电英属威海卫租借地行政长官路克哈特：“值此停战大喜之日，我向威海卫人民祝贺战争胜利，并感谢你们的帮助，从威海卫招募的华工军团对战争发挥了巨大作用，非常感谢华人社团对政府的衷心支持。”

按照招募合同约定，华工的合约期为 5 年，当战争结束后，许多华工仍然继续做战场清理工作，包括拆除未爆炸弹等非常危险的工作。当合约结束，思乡心切的华工大约有 10 万人选择离开欧洲，回到故土。英招华工的最后一批在 1920 年 4 月回国，法招华工也在 1922 年 3 月归国完毕。

一战华工的贡献使中国具有了名副其实的参战国和战胜国地位，100 年后得到了英法等国的认可。2016 年 12 月 11 日，由法国邮政部门和中法文化教育交流基金会联合制作的一战华工纪念邮票在法国正式发行，旨在纪念华工的贡献。2017 年 11 月，英国华侨华人发起了一场名为“确保我们铭记计划”的全国性运动，要在英国为一战华工竖立一座纪念碑，还他们一个公道。

处于历史大交汇期的隋文帝，结束了分裂的历史局面，统一了全国，迎来了一个繁荣稳定的社会，为其后唐代的全面隆盛奠定了基础。隋文帝在用人、倡孝、弘法、移风、察情等方面都有大的作为，为开皇之治的出现铺平了道路。这些成就的取得，离不开隋文帝勤于政事、兢兢业业的政治觉悟和从政的高度敬业能力。萧瑀评价隋文帝：“克己复礼，勤劳思政，每一坐朝，或至日昃”“亦是励精之主”。

隋文帝在用人方面费了很大精力。当他听闻一个叫高颖的能人，“习兵事”“多计略”，于是“意欲引之入府”，得到高颖的回应：“愿受驱驰，纵令公事不成，颖亦不辞灭族。”高颖的才华在隋文帝的赏识之下得以充分发挥，在隋文帝称帝、统一、改革事业推进过程中，功勋卓著，得到了隋文帝“识见通远，器略优深”的高度评价。连唐太宗都对隋文帝所重用的高颖发出赞叹：“朕比见隋代遗老，咸称高颖善为相者，遂观其本传，可谓公平公直，允识治体，隋室安危，系其存没。”

当时许多名臣济于一堂，共同辅佐隋文帝。苏威出身名门，深受其父“性俭素”的影响，以清明政治为己任。隋文帝在宫中以银为幔钩，苏威见之，以节俭美德谏言，隋文帝纳言听之，“雕饰旧物，悉命毁弃”。大理寺卿赵绰作为一名执法官员，受到隋文帝重用。当时隋文帝看到刑部有一个叫辛童的人犯有厌蛊之罪，欲杀之，但是赵绰认为按照法律不可杀，并据理力争，最终说服了隋文帝，并且得到隋文帝对他的赞赏。隋文帝时期，人才济济，韩擒虎、贺若弼、杨素等人都被其发掘重用。如果隋文帝没有用心发掘人才重用人才，就不会出现人尽其才之局面，更不会有治世局面的出现。

隋文帝以孝治天下。他亲临国子学祭奠孔子，命人讲授《孝经》，并结合现实予以阐释。讲完之后，隋文帝亲自为讲授之人授奖赐绢。开皇初年，田德懋因父去世而回家治丧，在其父墓旁搭庐守制。隋文帝听闻后发诏书予以嘉奖：“朕孝理天下，思弘名教，复与汝通家，情义素重，有闻孝感，嘉叹兼深。”

在总结历史兴衰经验基础上，隋文帝深刻地认识到物欲追求奢华会造成国家衰微，提倡节俭精神会促成国家富强。他对自己提出了“天下大同，躬先俭约”的要求，其妻独孤皇后亦“性俭约”。他平常吃饭，只有一道荤菜；每天乘坐的舆辇，屡坏屡修而没有换新。配制止痢的药品需要胡粉，在宫中竟然找不出；赏赐有功者衣物时，朝廷竟然凑不齐做衣物的料子。当时出现了这样的情景：“开皇、仁寿之间，丈夫不衣绛绮，而无金玉之饰，常服率多布帛，装带不过以铜铁骨角而已。”隋文帝所塑俭朴之风可见一斑。唐初史臣评价隋文帝“居处服玩，务存节俭”，由于他的以上率下，隋朝的社会风气中弥漫着节俭的味道。他三令五申，要求革除颓靡之风，这在他的诏书中得到鲜明体现：“诏犬马器玩口味不得献”；“太常散乐并放为百姓。禁杂乐百戏”等。当他看到太子杨勇有一具漂亮的蜀铠，就对其进行教育：“我闻天道无亲，唯德是与，历观前代帝王，未有奢华而得长久者。汝当储后，若不上称天子，下合人意，何以承宗庙之重，居兆民之上？吾昔日衣服，各留一物，时复看之，以自警戒。今以刀子赐汝，宜识我心。”时人评价隋文帝在移风易俗方面取得的成就时说：“及大隋受命，圣道聿兴，屏黜轻浮，遏止华伪。”

隋文帝不仅在改作风习气方面亲力亲为，还在改文风方面大力革新。当时李谔

躬先俭约的隋文帝

□ 石志刚

对魏晋以来形成的不良文风进行描述：“降及后代，风教渐落”；具体体现在“竞驰文华”“唯务吟咏”“竞一韵之奇，争一字之巧”，出现了“以傲诞为清虚”“以缘情为勋绩”的“日繁”之弊。隋文帝加大力度革新繁冗的文风。当时名将贺若弼撰写颂扬隋文帝的《御授平陈七策》，隋文帝不仅不看，而且对贺若弼说：“公欲发扬我名，我不求名。”不务虚名、不尚空谈。他要求各级官员“公私文翰，并宜实录”，并且把尚文藻华丽之人，当成轻薄者，加以弹劾。泗州刺史司马幼之上奏了一篇文词华丽的文章，隋文帝看过后，非常生气，将其交有关部门治罪，以惩戒繁冗华丽的文风。

隋文帝在考察地方政绩过程中，亲自询问有困难百姓：“乘舆四出，路逢上表者，则驻马亲自临问。”他还经常派人去全国各地进行采风，了解国情和社会：“潜遣行人采听风俗，吏治得失。人间疾苦，无不留意。”为了探视受难百姓的真实情况，他派人去做社会调查：“尝遇关中饥，遣左右视百姓所食。”当他看到百姓饮食非常粗陋，自责之意油然而生：“有得豆腐杂糲而奏之者，上流涕以示群臣，深自咎责，为之撤膳不御肉者殆将一期。”他在另一次关中闹饥荒发生后，亲率百姓赴洛阳“就食”，路上每遇扶老携幼者，即引马避在路旁，温言慰勉；遇危险之处，即命人上前扶助挑担者，其爱民之心由此可见一斑。

隋文帝执政时期，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都有巨大成就。这份成就的取得离不开他勤于政事的良好品质。正如隋文帝临终前所说：“昧旦临朝，不敢逸豫，一日万几，留心亲览，晦明寒暑，不惮劳苦。”对国家倾注巨大心力，专于国事，自然会取得成就。唐人高度评价隋文帝：“自强不息，朝夕孜孜，不庭股繁，脩藏充实，虽未能臻于至治，亦足称近代之良主。”

夷胡扬武风兼重文治

□ 谢德新

西晋之后，东晋对中原及边陲实际已失去控制力，尽管用义军和征伐等方式得到一些州郡，但已不是长治，久安更不能不。对这些地方有实际控制权的足趁隙而兴的少数民族，在东晋周边地区，先后出现了几个大的少数民族军事割据集团，即刘氏的汉，石氏的赵，冉氏的魏，慕容氏的燕，苻氏的秦，史称“五胡”，五胡乱华的说法也由此而来。

胡人是对少数民族的简称，过去单指西域的部落民族，后来便泛指区别于汉人的少数民族，其实这些人，都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汉人统治的政权窝里斗，造成国运衰落，生灵涂炭，是自己的错，不应归罪于这些胡人。有作为的胡人，趁机起事，割据一方，称王称帝，也是理所当然之事，何况这些称王称帝的胡人大多曾生活在晋朝，许多本身便是从天朝队伍中分化出去的，建国后，出于利益考虑，多多少少与自标正统的晋政权尚有联系，或称署郡，或称藩国，或结成利益同盟。反而是诸胡国之间互相争斗得很厉害，这给东晋政权得以偏安一隅创造了机会。

之所以会出现十六国并立的状况，一是因为胡戎各自为政，不团结，形不成对抗汉族的合力；二是武功有余，文治不足。倘若割据一方，

稳定一时，统治地盘稍大，就得取用汉文化的精华，采取儒道治国之术。刘氏的汉，慕容氏的燕，苻坚之时的秦，汉风熏陶尤甚。史载：“自永嘉之乱，庠序无闻，及坚之僭，颇留心儒学。”

慕容氏的燕，从慕容廆称公开始，到慕容暉被诛，历经四世，存在 85 年。起先从辽北起家，后来占领整个东北和燕赵之地，一度连豫、荆之地都占领了，甚至直逼洛阳，危及长安。灭魏之后，曾多次打败来讨伐的东晋王师。

慕容氏属鲜卑人，史书载，它世居北夷，号称“东胡”，后来与匈奴并盛，“控弦之士二十余万”，后来还是被盛极一时的匈奴打败了，仅剩的地盘是鲜卑山，因之以鲜卑为号。曹操派司马懿讨伐公孙氏，鲜卑出兵以功，被拜为王，在棘城立国。那时燕代之地的风俗是

人人都戴“步摇”冠，读音以讹传说，变成了“慕容”。

开立燕国的慕容廆父亲是鲜卑单于，迁地在辽东北。父亲死后，慕容廆的弟弟慕佳，还要杀他，他只好逃亡躲祸，后来国人将他弟弟杀了，迎接他回国上位。他当时少年气盛，上表晋武帝去伐另一小国，晋武帝不批准，便入寇辽西，于是晋派兵剿之，慕容廆被打败。这时，他认识到“华裔殊，强弱固别，岂能与晋竞乎？”便派人向晋投降，晋武帝封他为“鲜卑都督”。注意这个“理殊”，说明他认识到代表华夏的汉文化高出一等，因之不能与之抗衡，从此开始习汉之礼，取汉之俗，纳汉之风。

慕容廆的作法，也影响到他的儿子，第三子慕容皝继位后，“立纳谏之木，以开说言之

路。”“躬巡郡，劝谏农桑。”完全是儒家倡导的做法。为鼓励农耕，还学习魏武的一些作法，借耕牛给没有牛的人，让其在官苑中耕地，二八分成；有牛的也可来耕，三七分成；地方官如果劝农耕不力，则会被处以刑罚；敞开官方苑田，给无田的农民耕种，贫苦无资产没法生存的，赐给耕牛；核定手艺人人数，精简官吏人数，裁掉的官员去农耕。赐五万赏钱，悬“无言不酬”四字于宫外，向自己提意见的人，不拘贵贱，“勿有所讳”，言者均有赏。他还自己教学生，“惟好文籍，勤于讲授，学徒甚盛，至千余人”，亲造《太上章》，又著《典诫》15 篇，以教儿子和学生。

这些记载反映了慕容氏治燕的做法，深受汉儒文化的影响，有时甚至从汉人典籍中直接拿来使用。对前来投奔的汉臣，也很重视，特

别是那些有名望、有才华的汉臣，倚为左右手，四位慕容氏身边都有几位颇有影响的汉臣。

前秦苻坚做得也很到位。如在一次征讨时，敌方将领的儿子将父亲绑来投降，苻坚对他虽然赐赏，却认为这个儿子没有教养，送其去习礼。他还重儒学，轻老庄，坚持以儒学治国。

这些少数民族主动地汉化，使北方和西南地区的文明程度得到提升，也使汉文化演绎出了新鲜的版本。在南北朝的大乱之后，之所以能出现一个新的繁荣阶段，正是由于脱离了野蛮的北方，为萧疏疲敝的南方带来了清新之风，王谢风流并未散去，而是汇入了更加壮丽的南北合流之中。

两晋

脉望